

広東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武装闘
争と動員―海陸豊、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持続・変容する世
界および他者
との邂逅

一九一〇年前後の
チベット―四川軍
のチベット進
軍の史的位置

『一九四九年前後の
中国』をめぐる
対話

庶民
のための書
き言葉を求めて―清末か
ら民国へ

JAPANES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日本 中国研究

第一辑 历史・社会

中国共産党在广东
地区的武装斗争与动员
―以海陆丰为例（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

连续与变化的世界
及与他者的邂逅

一九一〇年
前后的西藏

―川军进藏一事的历史定位

关于
《一九四九年前后之中国》
的对话

寻觅下层民众的书
面语言

―清末至民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日本 中国研究

第一辑 历史·社会

JAPANES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日本中国研究. 第1辑, 历史·社会 / 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
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097 - 4847 - 3

I. ①当… II. ①日…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研究②社会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6566 号



当代日本中国研究 (第一辑 历史·社会)

编 者 / 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徐碧姍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徐碧姍

责任校对 / 刘玉清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847 - 3

定 价 / 5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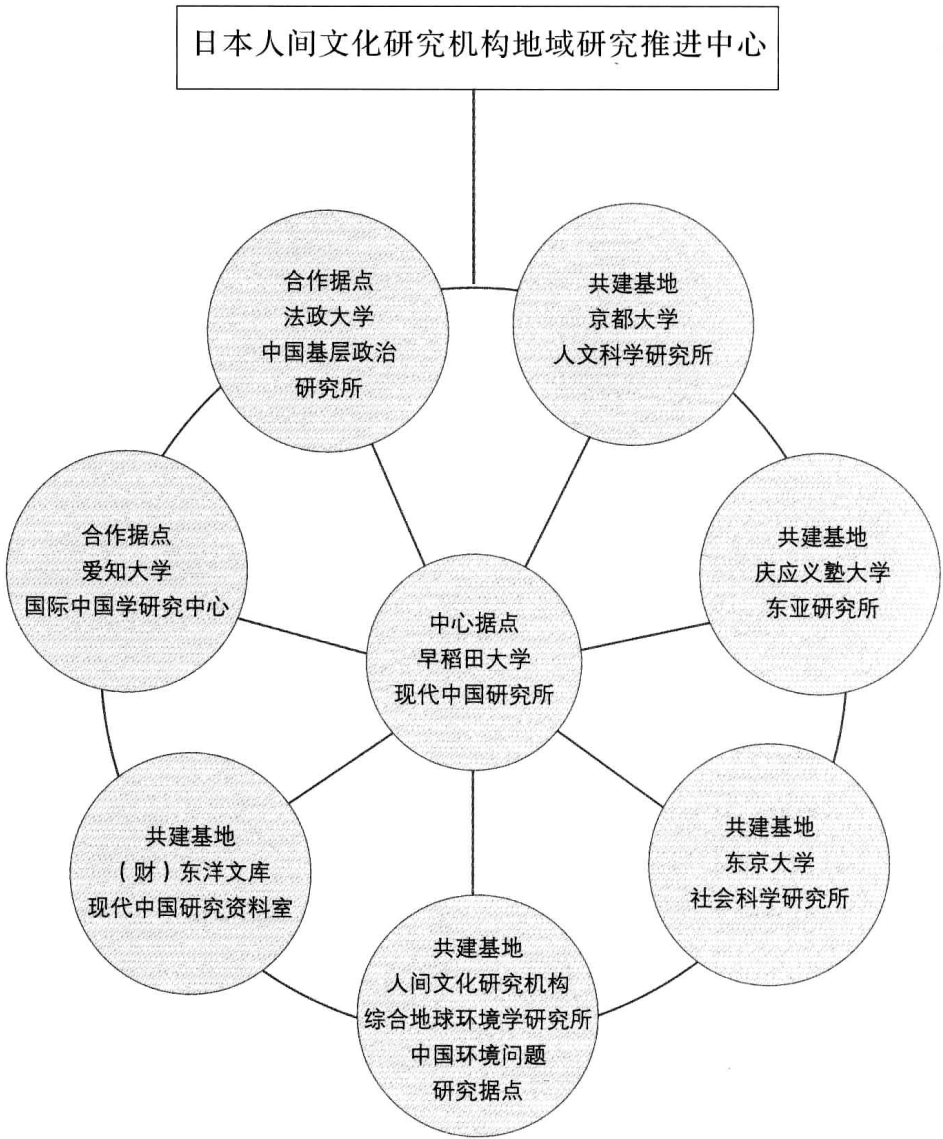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04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组织图



《当代日本中国研究》

2013 年度现任编辑委员

刘杰（早稻田大学教授）
川岛真（东京大学准教授）
福士由纪（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春利（爱知大学教授）
小岛华津子（庆应义塾大学准教授）
小野寺史郎（京都大学助教）
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
郑成（早稻田大学主任研究员、准教授）
中村元哉（津田塾大学准教授）

主编 刘杰

本辑特别编辑 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京都大学据点代表）

原则上，编辑委员来自各研究据点。现任委员中村元哉由东洋文库委派。2009～2013 年，还有以下学者曾担任过编辑委员（括号内为现任职务）。

高原明生（东京大学教授）
林秀光（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松永光平（庆应义塾大学特任讲师）
徐显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有关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的具体介绍，可参看以下网址（有中、日、英三种语言介绍）。

http: //www. china - waseda. jp/chinese/

创刊词

您手上的这辑《当代日本中国研究》，是由日本人间文化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组织编辑的学术论文集的创刊号。书中收录的论文和大部分书评原刊发于日本的学术刊物，集中反映了当今日本之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编辑出版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当代日本之中国研究的窗口，以促进中日两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经过数年的酝酿，本刊能够最终得以出版，同以下三个重要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中国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具有重视介绍国外学术成果，借此推动自身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对于这一点，我自身便有着真切的感受。记得1970年代末，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在北京、上海等地走访了数家书店。偌大的书店，书架上的书籍寥寥无几，且内容单调，无声地揭示了刚结束不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程度。然而，仅仅数年之后，情形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代初，中国书界掀起了一股出版国外学术译著的热潮。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量译著中，我注意到其中不少是1950年代面世的作品再版，这让我对中国的学术出版界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我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国外学术译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成为促成当今中国学术界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层意义上，我希望本书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第二，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的积极愿望。众所周知，日本的中国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但限于历史及国际环境因素，我们同中国学术界的

交流一直比较有限。冷战时期，日本的学者只能通过文字资料等有限的渠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均成为了可能，研究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尤其在近年，随着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来说，中国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更是重要的研究伙伴。本书希望通过介绍日本方面的学术成果，提高中国的学者们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关注，并得到他们具体的意见和评点，从而促进双向的学术交流。

第三，中国目前正处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并且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都给中国的学界，还有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独自的发展道路，建立了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发展模式，既充满魅力，又富有争议。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思考中国所要应对的种种问题，已不再是中国本身的课题，更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倍加关注的对象。从这一点来说，中日两国的学界有着众多的共同课题。

本辑选取的基本上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论文。所收文章中除了数篇书评为本编辑委员会的邀稿以外，其余的专题论文、书评以及研究动向均为日本的权威学术刊物的已刊论文。20 余位著者，除了数名著作等身的资深学者以外，大多为三四十岁的中坚研究力量。通过他们的研究，相信读者们一定会对日本的中国学界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长期以来以细致和扎实的研究风格广为人知。新一代的日本学者同样注重从某个地区的特定具体问题着手，通过细致的资料调查和现状分析，寻找出潜藏在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引导读者深入思考。

本刊的顺利出版离不开日本人间文化机构在组织及财政上的支持。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为有效开展和利用日本国内的学术资源，进一步开拓中国研究，于 2007 年以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东洋文库为共建研究基地，创建了“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2012 年，爱知大学和法政大学两校作为合作研究基地加入本项目。时值创立第 7 年，今天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将以下三条作为基本目标和课题。

第一，重振并推动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实现“现代中国学”的体系化。日本学界长久以来具有注重调查分析研究区域的具体实际情况的优良传统。为振兴和发展日本的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区域研究出现衰退，学界中普遍出现轻视跨学科研究倾向的局面下，我们坚持在保持学术传统的同时，将文明论、文化论、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兼容并蓄，摸索综合性的方法论，以进一步推进对中国的研究。

第二，为提高对现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水平，我们将采取以下具体措施。在项目内部的各研究基地之间，积极推广系统性有机性的研究课题，进一步增强各基地之间的横向学术合作。在建立面向国际学界的开放性的研究活动机制，同海外研究机构及人员合作开展研究的同时，使用汉语和英语积极对外介绍日本的中国研究学术成果。本刊便是其中一例。

第三，促进日本社会和普通国民对现代中国的理解。本项目不仅立足于学术层面的共同研究活动，我们还以推动社会对现代中国的广泛理解为己任。为此，我们多次举办了面向社会的公开讲座和大型公开研讨会。例如去年2012年，我们在东京、京都、名古屋、福冈举办了四次以纪念中日恢复邦交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这四次大会分别从文化、经济、外交、地区合作等多个领域探讨了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知名学者也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都表达了对当前中日关系的深切忧虑。研讨会的举办时期正值中日两国关系最为恶化之际，会议的准备和运营过程中的艰辛很难一语道尽。正因为如此，很多普通日本听众会后表示，在这一特别时期能够举办如此坦率交流意见的研讨会，意义非同寻常。

正如前文介绍，《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系列是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的集体合作的产物。各基地在本系列的组稿、审稿、翻译、校对、获取转载版权等编辑工作中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在此对所有曾参与过具体编辑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

以下为自2009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过编辑委员会成员或对编辑工作做出贡献的人员：刘杰（主编）、川岛真、福士由纪、高原明生、林秀

光、石川祯浩、松永光平、丸川知雄、小野寺史郎、小岛华津子、徐显芬、郑成、中村元哉。

本书能够在中国得以出版，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多年来重视中日间学术交流密切相关。在此我谨向谢寿光社长、杨群总编、徐思彦副总编和徐碧姍编辑的大力支持与合作表示深深的谢意。

天儿慧

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基地代表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 专题论文 ·

连续与变化的世界及与他者的邂逅	村田雄二郎 / 1
1910 年前后的西藏	
——川军进藏一事的历史定位	小林亮介 / 12
清末近代交通通讯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与中央、	
地方关系的重组	千叶正史 / 26
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	
——清末至民国	蒲丰彦 / 38
1920 年代中国女性剪发	
——舆论·时尚·革命	高岛航 / 61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地区的武装斗争与动员	
——以海陆丰为例（1927~1928 年）	阿南友亮 / 95
蒋介石与胡汉民在训政制度设计上的对立	
——党与政府、集权与分权	岩谷将 / 147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政策的演进过程	松村史穗 / 170
对自然的拥有形态的多重结构	
——“墾步及涌源”与“单宗耕地”范畴及其	
相关权益归属	片山刚 / 200

· 讨论 ·

关于《1949年前后之中国》的对话

——回应上原一庆教授和高桥伸夫教授的书评…………… 久保亨 / 226

· 书评 ·

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丛书 20 世纪中国史》

…………… 西村成雄 / 231

西村成雄、国分良成、深町英夫．《“20 世纪中国”政治史》

——新刊 2 册的介绍与点评…………… 水羽信男 / 242

平野健一郎．《日中战争期间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智英 / 248

段瑞聪．《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 小野寺史郎 / 254

郑浩澜．《中国农村社会与革命》…………… 角崎信也 / 261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建国前后的上海》…………… 三品英宪 / 268

园田茂人．《不平等国家 中国：自我否定的社会

主义的去向》…………… 南裕子 / 275

久保亨等．《现代中国的历史：两岸三地百年的历程》… 姬田光义 / 281

若林正丈．《台湾的政治：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战后史》

…………… 小笠原欣幸 / 286

松田康博．《台湾一党独裁体制的成立》…………… 金子肇 / 290

连续与变化的世界及与他者的邂逅

村田雄二郎

(东京大学教授)

◎ 原文刊载于：〔日〕飯島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シリ
一ズ20世紀中国史』第1卷、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7
月、1-12頁。

◎ 朱琳 译

一 引子

第1卷“中华世界与近代”大致考察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主要的考察对象是19世纪“中华世界”所经历的“近代”以及与之相伴的“传统”体制的变化与重组的过程。

二 19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

名为“20世纪”系列丛书，为什么其中收入了探讨19世纪的一册呢？首先就这一点进行一下说明。“19世纪”这一区分，不用说，是来自西方的时间范畴单位，同时代的中国人在生活时并非抱有这样的意识。当时一般意识到的是从清朝的乾隆、嘉庆到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样一个皇帝支配的时间（年号）的流逝，这与因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寿终正寝的王朝体制是互为表里的。在历史学上，这被看作是与被称为“清末（晚清）中国”“近代中国”的时期都有重合，与“古代”“近世”（early

modern) 相区别, 而具有某种特质的历史阶段^①。

所谓特质, 一言以蔽之, 就是与“西洋”“近代”的真正接触, 是对它的主体性的参与。比如, 中国大陆的主流见解是将中国近代的开端置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 这来自于对“西洋的冲击”给中国的对外体制和内政改革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重视。19~20 世纪的中国无法抛开与“西洋”“近代”的接触和摩擦,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 无论是中国人自身的反抗或是接受, 从强烈地意识到“西洋”这一他者的存在, 从而推进对以往体制和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这一点来看, 近代中国或者 20 世纪中国经过“与他者的邂逅”而实现了重大的自身变革, 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比如, 即便批判外来的冲击这一说明模式而探求内在发展的理路(コーエン, 1988; 溝口, 1989), 如果光靠已有的本土资源的话, 也无法完整地把握变革与转换的意义(夏, 2007)。可以说并不是“内”和“外”中的任何一方, 而是这两者的关联方式——通过“外”来发现“内”以及自我认同的变化才是近代中国历史本身。

然而, 无论说洋务、变法、革命, 或是说近代化, 以 19 世纪作为一个历史分期并无积极的根据。关注中国最后的王朝——清朝从“繁荣”到“衰亡”的转变过程, 在 1800 年前后(从乾隆末期到嘉庆年间)并非不能找到一个历史的分期点^②, 但是如果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 繁荣包含着衰亡的开始, 结束才意味着开始的话, 那么, 这一框架本身大概也有相对化的必要。

虽说如此, 对于着眼于变化与转换状况的历史学而言, 时代区分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如本卷所示, 虽然并非因为鸦片战争, 所有的一切都改

① 这里所说的“近世”, 大体上指明清时期的中国。这与西洋史、日本史的用法未必重合, 但是并非没有横向上的联动。岸本美绪关注到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中国、日本、朝鲜等同时发生了宏观性的变化, 诸如商品经济的跃动、社会秩序的重组、新国家的成立等, 从而将这一时期定位于东亚的“近世”(岸本, 1998)。本系列的“近代”可以说是位于这一“近世”结束时期的起点。

② K. Pomeranz 和 A. G. Frank 所提倡的全球史, 将经济力量上中国与“西洋”的优劣关系的逆转、其结果所带来的“西洋”称霸世界的转机置于 1800 年前后的时期(参照本系列第 3 卷总论“全球化的奔流与作为主体的中国”)。

变了，但是在清朝的外交史上，《南京条约》的缔结（1842 年）无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另外，若将视线转向制度上的变化的话，1861 年的总理衙门的设立、1906 年的官制改革的尝试也具有毫不逊色的意义。而在权力结构的转换方面，义和团事件以及随后的《辛丑条约》的缔结（1901 年）也许是重要的。还有，在确立近代的政治制度上，辛亥革命（1911 年）无疑是最大的转折点。更进一步，在思想文化的变化上，在导入体制变革（变法）论的意义上，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败北的 1895 年也有着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作为观察 20 世纪中国的视角，19 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无论是将其视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还是视为认知与制度的转型（transformation）（桑，2004）——变化的形态是多样且复层的，是互相包含着偏差与冲突的。在对“近代”的接近态度上，地区间、城市与农村间的差别也是无法忽视的要素。更进一步，根据时间框架设定的方式，体制、构造的不变（连续）的部分也随处可见，这一点正如本卷各章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本卷所考察的时期是迈向 20 世纪中国的助跑阶段，同时也可以说是“不变”与“变”、“内”与“外”、“传统”与“近代”交错相嵌为马赛克状、形成现代中国原型的时代。各章所论，并非简单地根据事件、运动描写阶段性前进的进化论的历史，之所以关注连续、重组了的制度状况以及隐藏在事件深层的心性和印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三 什么是中华世界？

以下就标题中的“中华世界”一词进行一下说明。说实话，在编辑本卷的过程中最费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初始阶段出现了使用“中华帝国”“中国式的帝国”等提案。但是，多名执笔者十分担心将“帝国”这一多义且暧昧的词语用于 19 世纪的中国是否恰当。其次，虽然也讨论了耳熟能详的“王朝体制”“传统秩序”等表达方式，但是考虑到这些未必拥有足够涵盖本系列各卷各章所讨论的问题的广度，所以最终决定使用“中华世界”一词来表示 19 世纪中国的制度与观念的复合体。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华”，不仅仅意味华夷秩序以及朝贡、

互市所包括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事实上,19世纪之前的中国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以及“南洋”“西洋”各国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讨论东亚地域秩序和国际关系时的具体对象。因为对于王朝的中坚人物而言,虽然那些地域在通商、军事方面有差异,但是毫无疑问分别都是重要的对象,而且,儒教精英也通过描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积极地参与包含着多重“中心—边缘”关系的“中华世界”的建构。这就似乎显示出从处于中心位置的精英视点出发的“中华世界”有着历史性的安定的结构,它跨越了秦汉以来长达两千年的时间,获得了扩大与发展。

但是,清朝中国,构架了包括对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所谓的“藩部”进行支配的复合性统治体制,这一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赋予了与此前的“中华王朝”所不同的性格。这不仅成为在19世纪“与他者的邂逅”的时期各种变革议论与自我认识的条件,也提供了从20世纪直到现在,与现代中国的领土、民族问题、大国意识直接相关的“统一中国”的原型^①。

关于这一点,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有着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关于中国史,此前都描述为统一与分裂的相互交替的历史,但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建立起以中原为中心、以华夏为骨干的集权型政权,然而其后的900多年间,直到蒙古统治的时期,中原政权的版图或扩大或缩小,中国的领域中不断地存在着中原王朝以外的自治政权。因此这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统一。中国的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通过平定准噶尔而完成对欧亚大陆的征服)实现的,这到鸦片战争爆发也仅仅持续了81年。所以,在中国历史中,分裂、分治的时期是主要的,统一是非常短暂的(葛,2008:77~78)。

这样在本系列第2卷第4章“历史学者与国土意识”所指出的“历史上的中国”论中,中国的统一、分裂的基准被设定在乾隆期的中国,在将获取最大版图的1759年定为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

^① 这里所说的“原型,身体”是指Thongchai Winichakul在论述泰国统治阶层制作地图的过程与民族主义诞生之间的关联性时所提到的“地理性身体”。

政权的势力范围与版图来计量“中国”的空间上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中国虽说是与1759年出现的“乾隆中国”相连接，但是也可以将其定位为清朝81年短暂“统一”的后续政权。这种极为现代的空间、领土认识，为考察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也提供了有趣的素材（黄，2005）。但是这里想强调的是，在其与清朝及以前的“中原王朝”的连续性上以及与外部（特别是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的关联上俯瞰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视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制度、文化里作为底流持续存在着的“传统”的力量浮出水面，波及现代化（近代化），其正反方面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种情形下所设定的“传统”绝不是指悠久的历史遗产，而大部分是指与近代相邻接而与“现代”相隔断的最近的“过去”，也就是17~19世纪的清朝中国。所以，为了理解剧烈变动的中国的“现在”，必须回到“乾隆中国”。换句话说，在注目于变化与转换的各种情形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持续着的“不变”的结构与意识，用200年到300年的较长的时间幅度来重新考察20世纪的中国。在本卷中各章考察的时期虽然有所出入，但是执笔者都持相同的理念，即一方面意识到时间的宽度，另一方面注意到历史的连续与变化的局面，我在此想重新确认这一点。

如此看来，“中华世界”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包含着通过天下（华夷）秩序与朝贡、互市所联结起的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抱有进一步超越高层次的文明体系的志向。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通过地域与国境区分的国家，与此同时，也可以将其定位成一个为海域亚洲与中央欧亚开辟的地域——竞技场（浜下，1990；Perdue，2005）。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据其开放性、广域性的原理，“中华思想”或许存在着区别于内向的、排他的“华夷思想”而作为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抽出的可能性（妹尾，2001：66）。

本卷所提出的“中华”就是在这样的含义下使用的。例如，清朝中期君临天下的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在《大义觉迷录》（1729年）中，提出跨越中华、夷狄之别的“华夷一家”“中外一体”的统合。清朝统治天下的关键，不是种族之别，而在于德的有无。清朝皇帝的统治的正当性，也与武力、出身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当时皇帝实施着历史上无与伦

比的仁政。雍正帝如此断言，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充满自信的态度，与贱民解放令、注重能力主义的人才提拔政策相得益彰，显示了清朝中国已经达到了开放的“中华思想”的顶点（岸本、宫嶋，1998：318~320）。

更进一步，如上所述，呈现出空前领土扩大的乾隆期中国的原像是现代性“统一”意识的源流，根据这一点可以将中华世界理解为超越了以往的华夷区别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复合国家。而且，这构成了内中包含空间上非均质性的、多元且阶层化的政治秩序，它无法收纳于同心圆结构以及汉族—非汉族的二元模式（岡，2007；杉山，2008）。这样一来，本卷所提出的“中华世界”，绝非超历史的固定的实体，而应该是清朝中国——或者中央欧亚的大清帝国——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创造出的复合型体制与秩序的称谓。

再附加一句，不使用“王朝”“国家”，而用“世界”这个词，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应该不仅着眼于生硬的制度与构造，而且要注意到官民的认识、思想的状况、感情及印象的膨胀与历史趋势的相互作用。

四 本卷的构成与内容

本卷由10章构成，在第I部“中华世界的构造与变化”（第1~3章）中，考察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的对外关系与统治体系的特质及其时代背景。如前所述，一直以来将中国近代的开端置于鸦片战争，这是一般性的理解。现在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教科书，多以通过《南京条约》开港和外交关系的确立，作为开端讲述中国近代史。然而，中国的执政者开始意识到以西洋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社会的存在，再早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所谓“洋务”时期。要说到真正的体制改革和接受“西学”，则要等到19世纪末。而且，若要说到努力从根本上转换“旧”体制的话，则只不过出现在王朝最后的10年——所谓清末“新政”时期。总之，无论是改革或是开放，都不是沿着预先构想的美好设计而前进的。“变”的局面，除去“新政”10年，往往是暂时的和零星的，“不变”的构造力也很强。“变”与“不变”的关系，由于时代、环境、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形。将此视为“近代”“进步”“文明”对于“传统”“后进”“野蛮”的征服，只不过是历史的后发智慧。